

清代西港地區人文聚落的發展與變遷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使本文結構與論證更為完整，謹此致謝。若仍有不妥之處，文責當然是由作者獨自承擔。

中文摘要

西港鄉位於台南縣西南端，曾文溪下游北岸，為台南市與北門地區的交通要道。北連佳里鎮、南接台南市安南區及台南縣安定鄉、西臨七股鄉、東與麻豆鎮為鄰，就台南縣的鄉鎮分佈狀況來看，並非是一個靠海、有港口的鄉鎮，但過去的歷文獻卻顯示出西港鄉與現今不同的地形地貌狀況。

本文的研究方法，擬由地理學景觀變遷的角度與歷史學文獻分析的方法，對早期西港鄉的人文景觀及聚落發展進行觀察與研究。透過對前人研究成果及相關文獻資料的閱讀，耙梳出與西港地區聚落發展有關的史料，並對這些文獻資料加以整理、解讀。希望透過本文的研究，讓讀者對早期台灣不同區域間聚落發展的狀況與人文景觀的變化，能夠有更深入的瞭解與認識。

關鍵字：台灣聚落、西港仔、西港鄉、聚落發展

一、前言

西港鄉位於臺南縣西南端，曾文溪下游北岸，為臺南市與北門地區的交通要道。北連佳里鎮、南接臺南市安南區及臺南縣安定鄉、西臨七股鄉、東與麻豆鎮為鄰，就臺南縣的鄉鎮分佈狀況來看，並非是一個靠海、有港口的鄉鎮，但過去的歷史文獻卻顯示出西港鄉與現今不同的地形地貌狀況。

自明鄭時代開闢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清朝康熙年間，大部分土地仍為臺江內海的一部份，當時的曾文溪由現在將軍鄉的漚汪溪（現今之將軍溪、或稱灣裏溪）出海。而臺江海岸線則北自漚汪溪口（將軍鄉山仔腳），往南經卓加港（七股鄉篤加）、含西港（西港鄉蚶西港）、西港仔港（西港鄉西港）、管寮港（安定鄉管寮）、直加弄港（安定鄉安定）、灣港（安定鄉港口）、洲仔尾（永康市洲仔尾）、柴頭港（永康市、臺南市柴頭港）、郡城（臺南市市區），至南郊瀨口（臺南市鹽埕）。¹因此可以說今日的西港、蚶西港一線以西，包括現今的七股鄉、臺南市的安南區等，在當時全位於臺江內海。

這樣的地理分佈情況，一直要到道光年間之後開始產生了變化。道光三年（1823），臺灣西南部發生暴風雨，因曾文溪夾帶大量崩塌之泥沙隨洪流而下，由安定鄉蘇厝附近向西港南下，形成區分現今西港鄉與安定鄉的天然界線。也由於曾文溪改道，原本應由漚汪溪出海堆積的泥沙，轉而流入了臺江內海。臺江內海在當時已有河流新港溪灌注，而曾文溪的改道使得這個海域同時注入了兩條河川，加速了下游泥沙的淤積，使得內海淤塞而漸成為陸埔。故早期臺江的海岸線，就是在歷年泥沙淤積之下，逐漸西移，舊時的內海，更隨著時間的演進，由滄海一變為桑田。

在海岸線西移後，西港鄉境內原先為臺江內海的部分，浮覆成陸地，濱海港口如含西港、西港仔也就逐漸的失去了功用，但也由於可耕埔地的出現，拓展了西港鄉民的生活空間。在這個特殊的時空環境下，

1 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七臺南縣〉（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民國91年），頁577。

清領時期的道光年間之前及道光年間之後，西港鄉的聚落發展各自扮演了何種特色與功用？聚落的變遷與發展的過程為何？現今西港鄉的聚落與過去聚落的關連為何？以及這樣的聚落變遷與變化，造就成了哪些西港鄉特殊的人文景觀？

有關臺灣地區聚落發展的研究，近年來已有許多學者對此區域進行研究，其中包括有地理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建築學、歷史學等各方面的專家，由各自的專長觀察聚落的變遷與發展，因此研究成果也特別豐碩。臺灣地區聚落受到地理環境、族群分布、政治環境、生活習慣、生產方式等諸多因素的影響，發展的過程與遭遇的問題不盡相同，假如想要了解西港鄉聚落發展的特殊性，就有必要先對各區域聚落發展的研究成果進行討論。故以下先就近幾年來，幾篇探討臺灣北、中、南等區域中聚落發展的研究進行介紹，再就本文的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來進行界定。

在臺灣北部地區聚落發展的研究中，施添福的〈清代臺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一）－以罩蘭埔為例〉²及〈清代臺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以苗栗內山的雞籠河流域為例〉³二文中，作者企圖引進國家和環境這兩個制約臺灣社會發展和變遷的概念，藉以理解臺灣地域社會的多樣性，在國家、環境、地緣、血緣等四種因素的交互影響下，將聚落發展區分為四種基本類型。⁴另外，施添福發表的〈臺灣傳統聚落的血緣構成：以研究方法為中心〉一文，⁵作者總結其二十餘年來從事聚落研究

2 施添福，〈清代臺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一）－以罩蘭埔為例〉《臺灣文獻》，55：4（2004），頁144-209。

3 施添福，〈清代臺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以苗栗內山的雞籠河流域為例〉《臺灣文獻》，56：3（2005），頁181-240。

4 該作者認為：「在國家和環境作用下，地緣和血緣可能的發展關係，具有四種基本類型：第一、當國家權力強而環境威脅大時，地緣的發展優於血緣；第二、當國家權力強而環境威脅小時，則血緣的發展優於地緣；第三、當國家權力弱而環境威脅大時，則地緣的發展優於血緣；第四、當國家權力弱而環境威脅小時，則血緣的發展優於地緣。而清代罩蘭埔地域社會的發展，則可歸入第三種基本類型。」施添福，〈清代臺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一）－以罩蘭埔為例〉《臺灣文獻》，55：4（2004），頁144。施添福的文章主要在論述罩蘭埔地處偏遠、交通不變，使得清代政府對此地的控制力薄弱。雖然政府將罩蘭埔畫為屯番的養贍埔地，但由於制度上的缺失，使這些埔地很早就變為漢人的拓墾地。再加上水患與生番的威脅，也使此地一直是自然環境對居民威脅很大的地區。在這樣的國家力量和環境交互作用下，罩蘭埔的拓墾主要是透過「頭家拓墾制」和「合股隘墾制」進行。頭家在這個偏遠的山區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感謝審查委員的指正。

5 施添福，〈臺灣傳統聚落的血緣構成：以研究方法為中心〉《宜蘭文獻雜誌》，47（2000），頁3-28。

的經驗，以宜蘭地區家族與聚落發展的關係為中心，呈現出如何透過相關資料的蒐集與研究的步驟，建構血緣跟聚落空間組成的關係。

在臺灣中部聚落發展的研究中，楊護源的〈清代臺中大甲溪南地區的聚落拓殖〉⁶一文中，主要觀察的重心為大甲溪南的地區開發，並論述到區域內聚落發展的狀況，並非探討單一聚落的發展。故文中除了探討清代臺中大甲溪南地區漢人的入墾過程外，也探討了大甲溪南地區聚落的入墾與分拓所產生的聚落演變狀況。另外，洪麗完的〈大社聚落的形成與變遷（1715 - 1945）：兼論外來文化對岸裡大社的影響〉⁷一文，作者從中部拍辜族一個定居聚落大社的形成與變遷，勾勒岸裡大社的發展與興衰歷史；並藉由聚落的發展，試圖解析外來文化對土著部落的影響過程與現象，除了描繪多元文化的面貌外，也說明岸裡大社在文化接觸與互動過程中的主動性與選擇性，而非必然的被融入主流漢文化中。⁸

在臺灣南部地方聚落發展的研究中，陳秋坤的〈帝國邊區的客庄聚落：以清代屏東平原為中心（1700 - 1890）〉⁹一文，作者試圖從清朝邊區拓墾的比較視野，敘述清代早期土著和漢人墾佃在臺灣開墾過程中，經由政府地賦政策和土地商品化，逐漸建立以家戶為地權所有單位，並以村庄作為納稅單元的體制。文中選擇屏東平原作為論述焦點，主要原因在於邊緣地區的佔墾和開闢，可以反映初期政經勢力的運作以及移民墾佃落地化（territorialization）的過程。¹⁰

由以上近年來與聚落發展相關的研究討論可知，聚落發展所牽涉的層面相當廣泛，故本文需要界定研究範圍。研究的時間以清代為主，地點為現今臺南縣西港鄉地區，內容在探討此地區的聚落發展，與受到地理環境影響時聚落變遷的狀況。此地區聚落發展的特色之一，在於位

6 楊護源，〈清代臺中大甲溪南地區的聚落拓殖〉《興大歷史學報》，17（2006），頁457 - 508。

7 洪麗完，〈大社聚落的形成與變遷（1715 - 1945）：兼論外來文化對岸裡大社的影響〉《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3：1，（1996），頁31 - 96。

8 同上註，頁33。

9 陳秋坤，〈帝國邊區的客庄聚落：以清代屏東平原為中心（1700 - 1890）〉《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16：1，（2009），頁1 - 28。

10 所謂「落地化」，主要指國家權力為求控制人民和自然資源而將移墾聚落「村莊化」，以便強迫人口定居在一定地籍上的宅園。同上註，頁3。

處不斷變化的臺灣西部海岸中，因此產生出許多獨特的現象，尤其是陸浮地的開墾與地區聚落在遭遇自然環境後的變化，均與前述強調國家政策、族群衝突等因素的聚落發展相關文章，聚焦研究的重心有所不同。其次，與聚落發展相關之地區社會的建立，包括地區社會內人口結構、社會結構、地方菁英、宗教活動儀式、生產方式、生活習慣等等一般地區聚落開發的議題，均非研究者所關注的焦點與研究主題。再者，本研究亦不涉及清代臺灣社會土著化或內地化的性質討論，也不預期套用其他社會科學對地區聚落研究的相關理論模式與模型。

而就西港地區聚落發展的特殊性來看，此地區的聚落早期緊鄰臺江內海，位居海、陸交通要衝，是漢人向嘉南平原拓墾與發展的根據地之一，而流經此區域的曾文溪，對聚落的發展也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過去雖有一些文章專門對臺南縣臺江內海的發展、西港鄉的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遷進行探討與論述，¹¹然而對西港鄉聚落發展與變遷的研究仍有不足

11 現今與臺南縣聚落變遷與發展的相關著作，包括了顏尚文、王俊昌、陳亮州、馬有成主持，《珍藏西港》、〈宏觀歷史卷〉、〈宗教民俗卷〉、〈常民文化卷〉（臺南縣西港鄉：臺南縣西港鄉公所，民國94年）、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七臺南縣〉（南投市：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民國91年）、吳新榮等，《臺南縣地名研究輯要》（臺南：臺南縣政府，民國71年）、陳國章，《臺灣地名辭典》（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所，民國87年）、黃文博，《南瀛地名誌—北門區卷》（臺南：臺南縣文化局，民國87年）。林聖欽等撰，《臺灣地名辭書》（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2年）。盧嘉興在〈曾文溪與國塞港〉一文中，除了對國塞港的位置有所探討外，也對曾文溪改道的情況，以及臺江內海陸浮、區域土地的開發亦有所討論。盧嘉興，《曾文溪與國塞港》《南瀛文獻》，8，（1962），頁1-28。另外，盧嘉興在〈曾文溪中游主要溪道有無改道之論證〉一文中，針對洪調水先生來信所提問題，根據舊籍記載並就輿圖、保圖及地形狀況等資料，加以探討灣裡溪中游主溪道有無改道。本篇文章對西港地區曾文溪改道後聚落發展的影響，稍有觀察論述。盧嘉興，〈曾文溪中游主要溪道有無改道之論證〉《臺灣風物》，28：2，（1978），頁111-115。方淑美，〈臺南西港仔刈香的空間性〉是首先對本區各村落發展與宗教活動進行詳盡的調查與研究的論文，文中透過對西港仔香的研究，顯現了居民意識中的空間觀，更揭露了人群活動的空間性。方淑美，〈臺南西港仔刈香的空間性〉（國立臺灣師大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李淑玲，〈西港鄉聚落的拓展與開發之研究〉以位居古臺江內海的西港鄉做為主要研究核心，內容在探討臺江內海陸浮、曾文溪改道等地理環境變遷的影響下，漢人進入開墾，追求生存和發展，逐步建立聚落的過程。李淑玲，〈西港鄉聚落的拓展與開發之研究〉，（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依據不同的歷史時期，探討臺灣移民拓墾的過程，並分析臺灣南北村落形態差異的原因。陳胤霖的碩士論文〈臺南市安南區傳統村落祭祀空間之研究〉討論居民在移墾過程中，移墾者受到地理、政治因素的影響，對安南區地理環境演變的介紹相當詳細，並大量使用圖表說明聚落移墾的過程與村落的發展。陳胤霖，〈臺南市安南區傳統村落祭祀空間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歷史與理論組碩士論文，2001）。此外，還有許多的作品與論文雖然不是直接談論聚落的變遷與發展的，但內容或多或少會與其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這些作品的研究，大部分著重在單一聚落發展的介紹或研究，較少論述到有關一個地區的聚落在不同時間間，所扮演的功能與角色。

之處，故此專題仍有再進一步討論與分析的空間。

因此本文的研究方法，擬由地理學景觀變遷的角度與歷史學文獻分析的方法，對早期西港鄉的人文景觀及聚落發展進行觀察與研究。透過對前人研究成果及相關文獻資料的閱讀，耙梳出與西港地區聚落發展有關的史料，並對這些文獻資料加以整理、解讀。希望透過本文的研究，讓讀者對早期臺灣不同區域間聚落發展的狀況與人文景觀的變化，能夠有更深入的瞭解與認識。

二、道光時期以前西港鄉聚落的發展與變遷

清代早期西港鄉的聚落發展，受當時臺灣地理環境的影響頗深。臺灣地區的水文河川，與中國大陸最大不同的地方，在於中國大陸的河川大多是由西向東流入大海，而臺灣地區的水文溪流，大多卻由東向西流入臺灣海峽。此外，在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大、小河川多達129條，超過100公里的河川共多達了六條之多，而大部分的河川流域分佈在西部平原一帶。這樣綿密的水文河川系統，使得臺灣早期南北交通往來非常不方便，也將臺灣地區聚落的變遷，切割成了一塊塊開墾發展的單位，形成不同的人文生態景觀。

（一）沿海港口聚落

由於河川的阻隔，陸路交通不便，早期臺灣聚落開墾與發展所需的日常生活物資，就有賴於海上船隻的運送補給，沿海港口也就容易形成對臺灣內地開墾的物資轉運補給中心與窗口，規模較為龐大的海港聚落也就從此產生。清代早期西港鄉的聚落以西港仔與含西港兩地為主，這兩個聚落的形成可由文獻史料考據出。《諸羅縣志》上記載：「西港仔港（海汊。有港。小杉板頭船到此渡客，並載五穀、糖菁、貨物。港水入至安定里西保止。港口有魚塭）」「含西港（海汊。小杉板頭船到此載五穀、糖菁、貨物，港水亦至安定里西保止，港口有

魚塢)。」¹²可知在康熙年間，西港地區聚落發展稍有規模者，以西港仔與含西港兩地為主。在1784年之前，清廷僅准許開放安平港直接與大陸貿易，當時安平為臺灣島對內、對外貿易唯一的「正口」。西港地區與臺南府城的陸路交通由於隔著一條新港溪，交通不甚方便，故早期大部分開墾時期的物資都是經海運，由臺南府城安平港運至西港仔及含西港兩個聚落，再由這兩個聚落運送至其他西港地區內陸的小聚落。

在對外交通方面，早期西港地區聚落的發展也非常依賴西港仔、含西港兩個港口，當時甚至與臺南府城安平港有對渡的船隻通行其間。蔣毓英的《臺灣府志》就有記載：「西港仔渡，在小媽宮口」¹³高拱乾編著的《臺灣府志》另記載：「西港仔渡、含西港渡、直加弄渡以上三港渡頭，俱在西定坊小關帝廟口。」¹⁴由這兩本資料編撰的先後順序，可知西港地區聚落的發展，西港仔或許稍早於含西港。另《諸羅縣志》上記載：「……、竿寮渡、西港仔港、含西港渡、直加弄港渡(以上四渡，俱屬安定里·設雙桅杉板頭船以渡往來行人，水程至府三十里)」。¹⁵此二渡船頭當時由於水程至府城比陸路方便，故渡口在西港地區與府城之間的交通扮演著重要角色。也由於利用渡船的民眾頗多，清政府也對渡船頭課以港餉。當時西港仔及含西港每年需繳納港餉銀九十七兩三錢七分二釐八毫，佔所有諸羅縣水餉收入四百六十二兩四錢二分二釐八毫的五分之一左右。¹⁶由上述討論可看出清領初期西港仔、含西港二渡頭除了負有販運商貨的功能外，並負有交通西港、府城兩地大眾運輸的責任。這些特殊的因素，均有助於此二聚落的形成與發展。

12 周鍾瑄纂修，《諸羅縣志》，〈卷八·風俗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17。海汊與海港的區別，《諸羅縣志》記載：「閩、越間水源自山匯流揚波謂之溪。溪漸於海，潮汐應焉，謂之港；海汊無源，潮流而瀦，隨其所到以為遠近，亦謂之港。」由於含西港、西港仔皆無溪流注入，港灣不深，僅容許小舢舨船停靠，因此名義上雖稱為「港」，但仍與文獻記載上對「港」的定義有所區別，故稱為「海汊」。周鍾瑄纂修，《諸羅縣志》，〈卷一·封域志〉，頁11。

13 蔣毓英，《臺灣府志》〈卷之六·市廛〉（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31。

14 高拱乾纂修，《臺灣府志》，〈卷二·規制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38。

15 周鍾瑄纂修，《諸羅縣志》，〈卷二·規制志〉，頁32 - 33。

16 周鍾瑄纂修，《諸羅縣志》，〈卷六·賦役志〉，頁114。



圖1 康熙年間海岸圖：參考描繪自王俊昌、陳亮州、馬有成，《珍藏西港·宏觀歷史卷》（臺南縣西港鄉：臺南縣西港鄉公所，2005年），頁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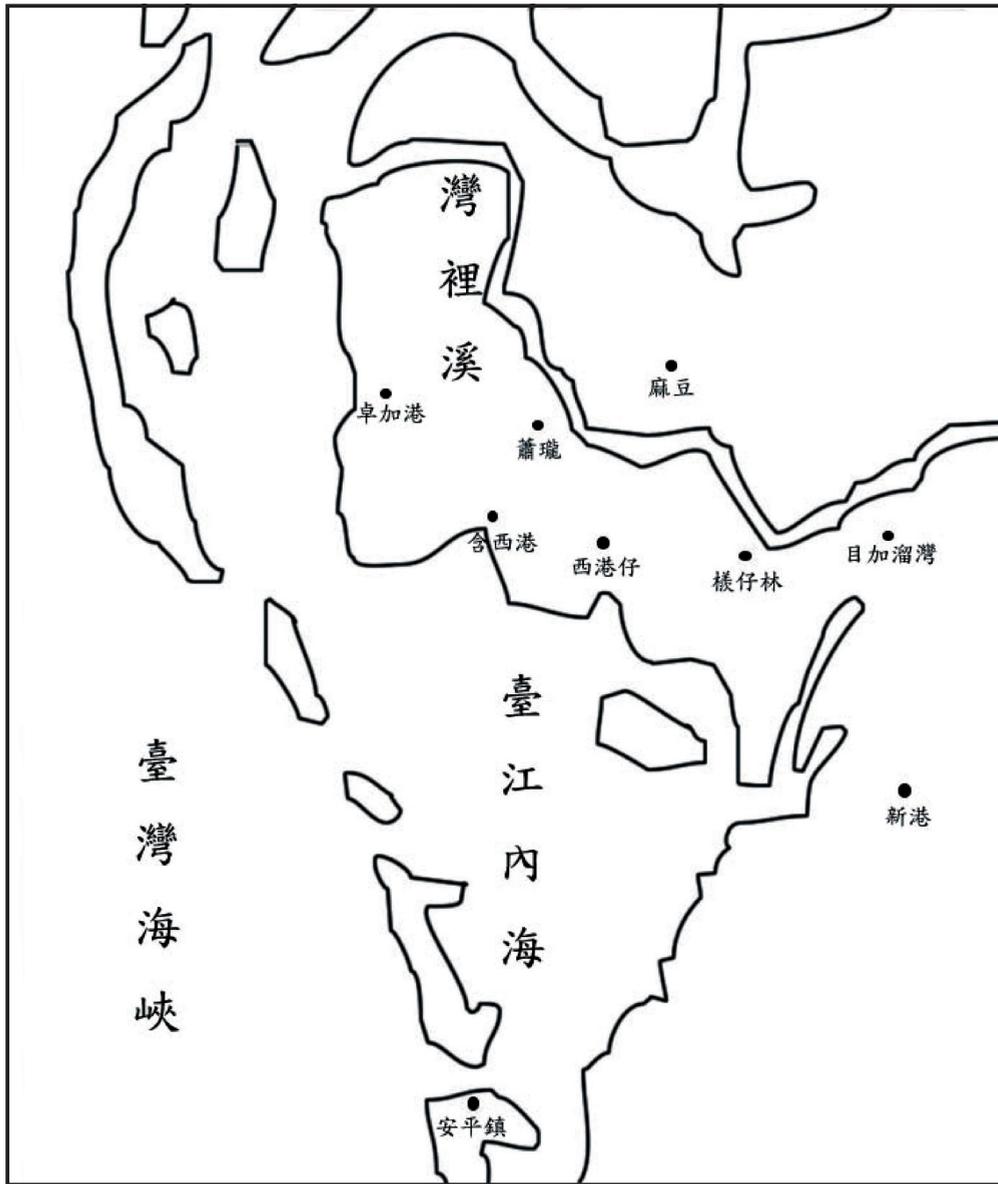


圖2 乾隆年間海岸圖：參考描繪自王俊昌、陳亮州、馬有成，《珍藏西港·宏觀歷史卷》（臺南縣西港鄉：臺南縣西港鄉公所，2005年），頁30。

（二）交通要衝、位置特殊

清領初期西港地區聚落發展的另一項特色，反映在它「過境」之交通重要性。由於西港地區南接府城，北連諸羅縣縣治，地理位置之形勢相當重要。臺灣地區發生的三大民變中，朱一貴事件與林爽文事件的平定，西港地區即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康熙六十年（1721）四月，朱一貴聚眾抗清。當時西港仔一帶的居民，在朱一貴攻陷府城後不久，即成立自衛性組織。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得知臺灣生變，命令水師提督施世驃與南澳鎮（廣東省南澳縣）總兵藍廷珍率軍一萬多人，赴臺平亂。征臺大軍抵達鹿耳門後，雖然很快的收復了安平，但由於朱一貴退守府城，又因府城與安平相隔臺江內海，不易直接攻下，清軍僅能與之形成相持的局面。為了打破僵局，對府城的攻略行動需另闢陸路互相配合。此時，有西港仔居民，攜帶酒、羊到安平鎮，向清軍輸誠，表示願意引導清軍由西港仔登陸，並以家屬為人質。之後清兵順利的在西港仔登陸，不僅在蘇厝甲（安定鄉蘇厝村）擊敗朱一貴眾之民兵，更率領大軍南下破敵軍於新港木柵仔。其後，與施世驃聯合攻擊府城，當日即收復府城，朱一貴則率眾逃逸。¹⁷

同樣的，乾隆五十一年（1785）的林爽文事件，也可以看出西港地區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乾隆五十二年三月，當林爽文與莊大田圍攻臺灣府城時，閩浙總督李侍堯上奏給乾隆皇帝的奏章中就提到：「……。又據臺防同知楊廷理稟稱，北路賊連日焚劫各莊；涵（含）西港為米糧通郡之路，被賊梗塞，府城米價益昂。」¹⁸所幸在這些民變中，西港地區的居民均站在援助官方對抗起事者的立場，使得清廷得以順利平定臺灣的民變亂事。¹⁹

由於西港地區的地理位置重要，除了為府城北邊之屏障外，又有海港需巡防，故清領時期為維護此地治安與稽查不法，最遲在康熙末年

17 藍鼎元，《平臺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頁14-16。

18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臺北：編者，1961年），頁267。

19 林爽文事件西港地區的民眾亦是站在官方的角度對抗起事者。當時守護府城的臺防同知楊廷理即稟稱：「臺灣府城尚有賊匪連日攻西港、蕭隴等莊，具被民兵殺退，」可見當時西港百姓與官兵合作，以保衛鄉里安全。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738-739。

時，即設有西港仔汛及含西港汛。據《諸羅縣志》記載：「西港仔，目兵十名。含西港，目兵六名。卓加港，目兵十名。與上二港，俱商船出入之處。以上八汛，俱屬目加溜灣千、把總兼轄。」²⁰由此可知當時清政府在西港仔、含西港及卓加港設置兵丁巡防，主要的目的係因此地「俱為商船出入之處」，故而此地配備有二十六名兵力稽查出入港口的船隻，受目加溜灣千、把總所兼轄。

然而來臺戍守之班兵軍紀不佳，將領也帶頭營私牟利，使得各地防汛兵丁並未確實到達駐防地點執行任務，造成防地空有戍守兵丁額數之分配，而無實際巡防之人力，各地防汛之兵房也逐漸毀壞。這種現象由《欽定平定臺灣紀略》上的記載可以看出：「臺灣營伍廢弛，總由總兵營私牟利，備弁等相率效尤，縱容兵丁離營他出，貿易謀生；甚至包庇娼賭，無所不為。將情兵驕，實由於此。」²¹無法發揮正常功效的防汛配置，也就無法阻止無照客民偷渡來臺灣，在各處小港如西港仔、含西港登岸。原設防守汛兵，也因塘汛傾圮，營制廢弛，並不各歸汛地，甚至得賄縱容偷渡客，任聽出入，以致臺地遊民私渡日多，奸宄潛滋，無從盤詰，至乾隆年間終於釀成了林爽文事件的發生。事後雖然福康安上奏，宣示加強整頓臺灣之軍事營務，重新整理防汛地之營房，但並未調整臺灣各地駐防之汛兵人數。²²

然而隨著臺江內海陸浮，含西港、西港仔逐漸喪失港口功能後，西港地區防守汛兵又再次進行了調整。道光十三年（1833）張丙事件發生後，閩浙總督程祖洛上奏酌籌臺灣善後事宜二十條的奏摺中提到：「酌議裁改汛防，以資巡查彈壓也。臺灣各營汛防，自嘉慶十五年前督臣方維甸議定裁移歸併，奏准遵辦，迄今又閱二十餘年，滄桑屢易，有必應酌量裁改之處。……，以二十名同外委一員駐紮蕭壟為蕭壟汛，以七名駐紮距蕭壟五里之西港仔，歸蕭壟外委管轄。」²³也就是在林爽文事件後原本未調整的防汛，至嘉慶年間督臣方維甸重新提出整

20 周鍾瑄纂修，《諸羅縣志》，〈卷七·兵防志〉，頁119。

21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1005。

2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臺灣紀略》，頁1004 - 1006。

2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甲集》〈卷二·閩浙總督程祖洛奏酌籌臺灣善後事宜摺〉（臺北：編者，1959年），頁113。

理防汛的意見，想將功能已喪失的防汛裁撤，並調整其他地方之防汛工作。雖奏准遵辦，卻一直未有動作，直到張丙事件後清廷才重新思考調整防汛的重要性，將功能已趨退化的含西港汛裁撤，西港仔汛的防務也裁減為目兵七名。

同治八年（1869）清廷因綠營兵丁在太平天國之亂後不堪使用，再加上臺地綠營兵丁在太平天國之亂起後即未再與福建兵丁進行輪調，離營謀生者頗多，造成營區內兵丁有額無員，故而開始進行裁兵加餉的策略。當時又對各地汛塘的佈署重新調整，西港仔塘舊設兵丁七名則遭撤除。²⁴

由上述西港地區塘汛設置的情況來看，其前、後期設置兵丁考量的因素有所不同。清初在西港仔與含西港設汛，目的在於稽查臺江內海港口、海岸的防務；道光以後，由於臺江淤積，地形大變，且西港仔在此之前即已失去航運功能，在西港仔設塘，應是著眼於海線南北陸路線的控制。²⁵

三、道光時期以後西港鄉聚落的發展與變遷

道光三年（1823）曾文溪改道，原經樣仔林西北方的河道，轉而由西南方，流向安定鄉港口、管寮、新吉、海寮等村之間，再流入臺江內海。²⁶此次曾文溪河川的改道，逐漸改變了西港地區聚落的發展型態。河川的改道深受自然環境因素的影響，徵兆出現在道光三年元月的地震，《福建通志臺灣府》記載：「道光三年，臺灣正月初三夜地大震。」²⁷此次的地震雖然沒有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五十七年

24 西港仔原為防汛，但在道光年間裁減兵丁後，可能因西港仔港口機能喪失，而將原有稽查港口的汛兵，改為傳送公文至府城的塘兵。至於何時做的調整，現有史料並未有進一步的說明。薛紹元，《臺灣通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頁657。

25 王俊昌、陳亮州、馬有成，《珍藏西港》〈宏觀歷史卷〉（臺南縣西港鄉：臺南縣西港鄉公所，2005年），頁47。

26 林聖欽等撰，《臺灣地名辭書·卷七·臺南縣》（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2年），頁557。

2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福建通志臺灣府》（臺北市：編者，1960年），頁1041。

(1792)的大地震般，造成臺郡、諸羅地區人員的傷亡，但曾文溪上游土石或因此次地殼變動，已有鬆動的現象出現。加上臺灣西部降雨高度集中，夏季盛行的西南季風常會造成地方性雷雨，降雨集中且強度大，使土壤大量沖蝕。故道光三年（1823）七月，本區一場大風雨，使下游原本北流的曾文溪，在蘇厝甲改道流入臺江內海，因河流夾帶內陸高山崩塌的沙泥，使臺江內海漸被淤塞，陸埔逐漸浮現，西部沿岸地形發生重大的改變，直接的衝擊到本區聚落的變遷與發展。²⁸

除了自然因素影響河道的改變及臺江內海陸浮地的產生外，人為開發造成自然景觀破壞的因素，也是必須加以注意的。諸羅地區在清朝剛將臺灣收入版圖時，據蔣毓英《臺灣府志》的記載：「實在民口七千八百五十三，男子四千一百九十九，婦女三千六百五十。實在番口四千五百一十六。」²⁹即實際人口民、番共計僅有12,369人。但隨著土地的開發，移民的進入，到嘉慶十六年（1811）時，臺灣地區的人口已增加到1,944,737人，當時僅就嘉義縣地區而言，人口估計即達到819,000人，³⁰是康熙年間諸羅地區人口的68倍左右。大量人口的移入臺地從事開墾與砍伐森林，或許會破壞原本溪流沿岸的水土保持，間接加速了內陸高山及溪流沿岸土石的崩塌，導致河川改道沖刷大量土石，河口海岸也就以驚人的速度獲得成長。³¹

28 方淑美，《南瀛地形誌》（臺南縣：臺南縣文化局，民國89年），頁134 - 135。

29 蔣毓英，《臺灣府志》〈卷之七·戶口〉，頁138。

30 陳紹馨著，《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31 有關清代漢人在曾文溪開發及砍伐森林的情況，並未有充分的史料可以做長時間分期演變的分析。惟大量人口的移入開墾，對自然生態環境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再加上地震等自然災害的影響，故有此推論。另外，范勝雄〈臺灣府半月沉江〉一文也認為，康熙以降，隨著內山土地的開發，臺江因「內受各山溪之水」，上游泥沙土石被河水夾帶至下游，流洩入臺江者越來越多，使得沿海地帶漸有淤沙。先是臺江南部近府城之海岸線逐漸向西推移，荷蘭時期海水可直達赤崁城下，鄭氏時期海岸線已西移至今西門路一帶，至康雍乾時期海岸線又向外推至西門路、文賢路、協進街附近。范勝雄，〈臺灣府半月沈江〉《臺灣文獻》，29：3（1978），頁145 - 149。推論部分另參照本文註28之參考資料。感謝審查委員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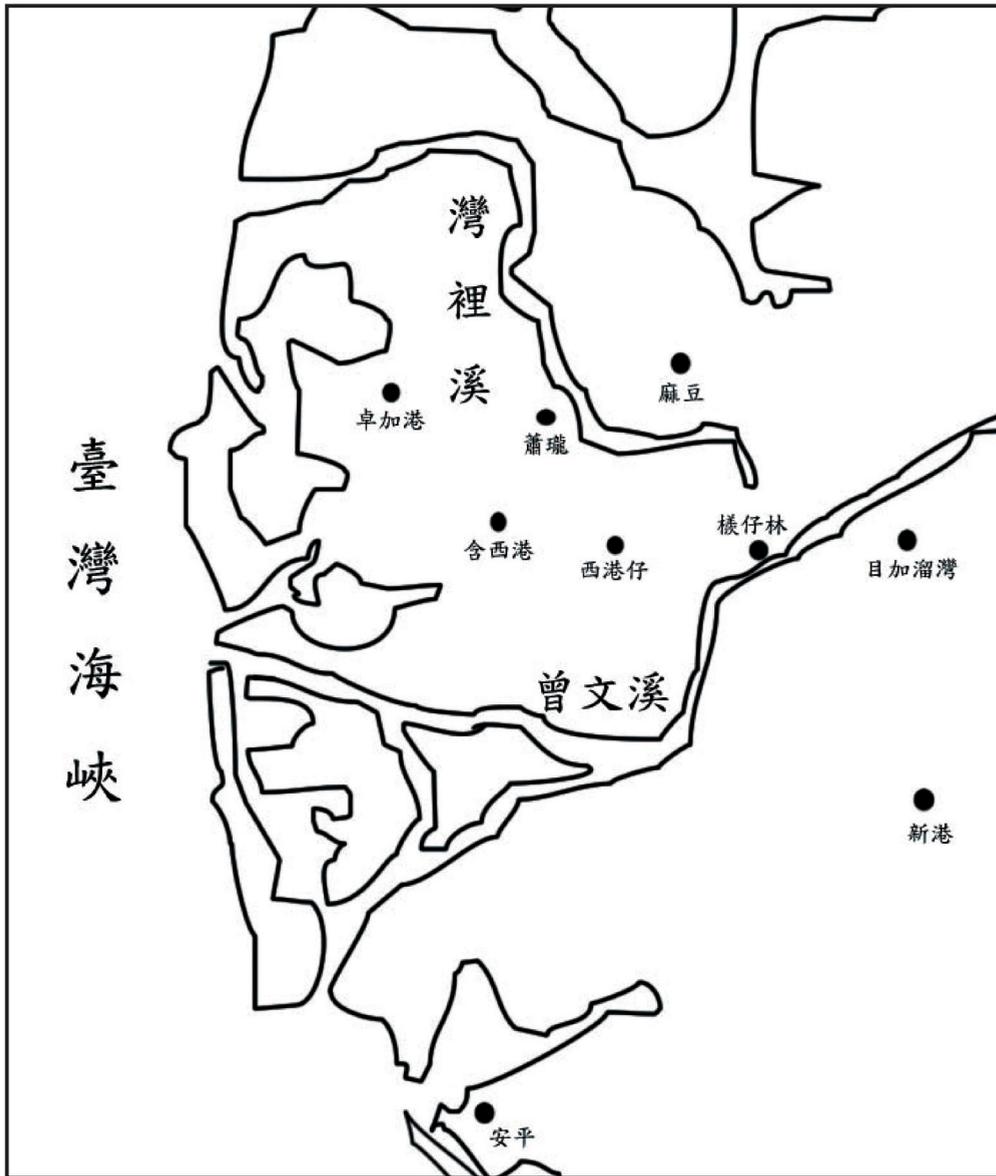


圖3 道光年間海岸線圖：參考描繪自王俊昌、陳亮州、馬有成，《珍藏西港·宏觀歷史卷》（臺南縣西港鄉：臺南縣西港鄉公所，2005年），頁30。）

曾文溪改道後，對西港地區聚落發展與變遷的影響，大致上可由新生浮覆土地的爭執及聚落的變遷與發展兩方面來討論：

（一）新生浮覆土地的爭執

曾文溪此次改道，對西港地區聚落變遷的影響，首先表現在陸浮新生地使用權的爭奪上。根據文獻記載，乾隆年間西港地區的中營、灣港、含西、管寮、西港里一代新生陸埔海坪的利用即衍生使用權的糾紛。先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時，安定里東西保鄉人蔡華仁等人，控告流寓棍徒方鳳等人，與陳閔德勾結，借陳閔德於乾隆十二年（1747）認課報陞，向縣請給土地的開墾憑證，侵佔安定里一帶海坪，致使西港地區之居民無法利用海坪採捕營生。嗣後經當時臺灣知府覺羅四明判決，認為：「至此海坪，歷無認課納餉，本係天地自然之利，原聽鄉民採捕營生；既據夏令議請歸公，并二比已各具有遵依，應如所議，將方鳳等所佔海坪概行歸公，悉聽該地鄉民公全採捕。」³²並由余文儀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立「嚴禁霸佔海坪示告碑記」示禁，問題才有所解決。

然而事情並未因此結束，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林爽文事件結束後不久，邱姓、方姓兩大家族，串連蚶寮莊的黃姓大家族，利用沿海插標、搭寮，截奪各莊採捕，幾致釀成械鬥大禍數次。嗣後因地方官員在司法處理的程序及作法上，引起向忠里地方仕紳及民眾不滿，以致上訴到福建巡撫，批示臺灣府知府重申：「示仰向忠里安定東西二堡鄉民人等知悉：爾等務須凜遵憲令，即將該處沿海一帶海坪，聽民公眾採捕；併將現搭海寮全行拆去，毋許少有存留，以杜爭端。倘有不法奸民敢於仍前□段築圍聚□搭寮冀圖霸佔，及不將海寮登時拆燬，併阻截各莊民採捕致生事端者，許爾等莊民指名具告，以憑嚴拏從重究辦；該地鄉保縱容不報，一經查出，或被告發，定行一併嚴究。本府言出法隨，決不寬貸。各宜凜遵，毋違！特示。」³³並重新立碑示禁，

32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年），頁387-389。

33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南部碑文集成》，頁425。

才弭平此次的紛爭。

此外，曾文溪改道浮覆的土地增多，官方在道光七年（1827）時對臺江內浮覆的土地出示招墾。³⁴之後此區域在開墾的過程中，曾因土地糾紛而引發西港地區聚落族姓的械鬥。西港鄉的郭姓先民渡海來臺後，在曾文溪旁的大竹林（今西港鄉竹林村）落地生根，子孫人數逐年增加，漸漸形成一股不小的族群勢力。郭姓族群因為拓墾問題，時常與西港鄉另一黃姓族群產生土地的糾紛，雙方長期不睦、關係緊張，甚至產生嚴重的族群衝突。黃文博在《南瀛地名誌》中，敘述了原因與當時對立的狀況：「遠因是道光年間的開墾問題，大竹林、大塭寮、郭份寮（來自布袋郭岑寮）的郭姓墾戶，不願與樹仔腳、溪南寮、埔頂、蚶寮（含塭仔內）、七十二份的黃姓墾戶併墾，致結下恩怨，時有土地之糾紛，而經常引發黃郭械鬥。」³⁵雙方的紛爭雖然經官方勘查界線後暫告一段落，但爭執仍然未獲得圓滿的解決。到日治初期，終於爆發曾文溪溪埔地開發史上有名的「黃郭械鬥」之歷史悲劇。

34 陳國瑛，《臺灣採訪冊》（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頁5。

35 黃文博，《南瀛地名誌—北門區卷》（臺南縣：臺南縣文化中心，199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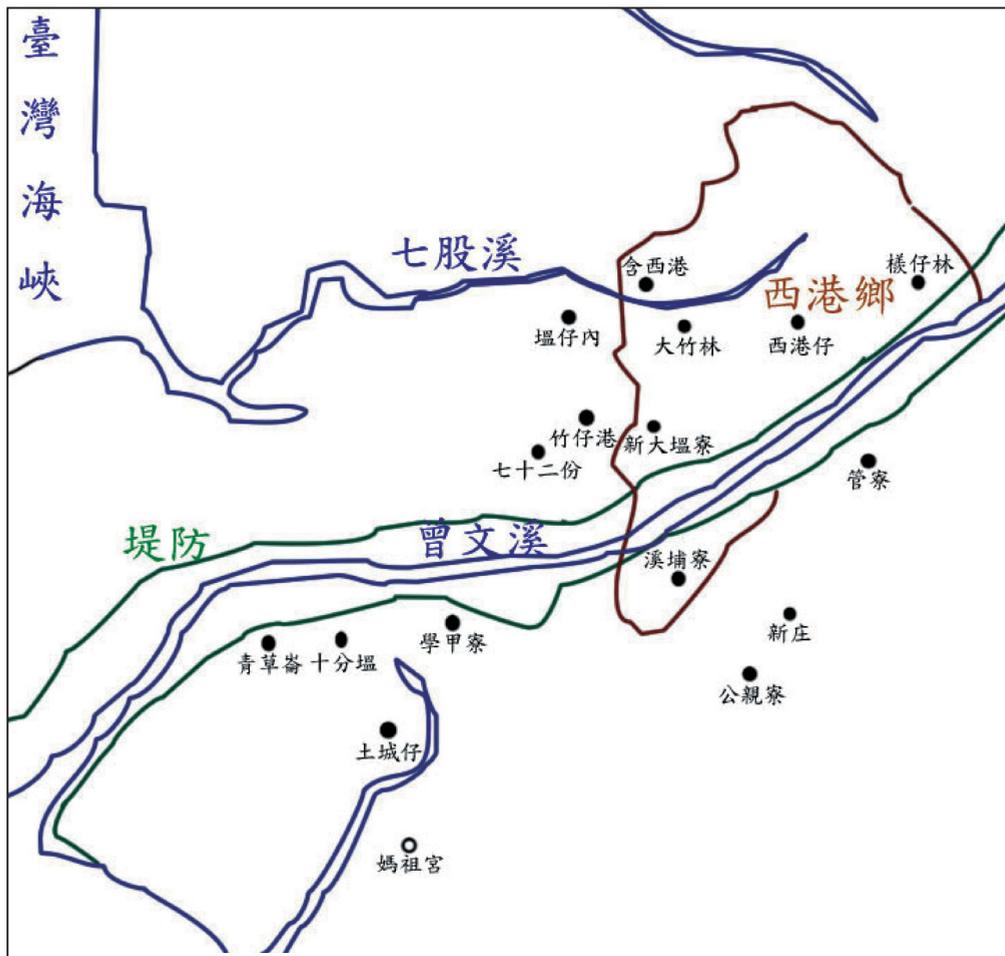


圖4 光復後曾文溪下游聚落示意圖，圖中大竹林、大塢寮、郭份寮（來自布袋郭岑寮）的郭姓墾戶在今西港鄉境內，樹仔腳、溪南寮、埔頂、蚶寮（含塢仔內）、七十二份的黃姓墾戶則來自今學甲、將軍、七股等鄉。

現在西港鄉古老相傳的一句諺語「西港仔黃郭相剗十三冬」，就是在描述這場日治時期維持了13年之久的械鬥。事件發生之後，黃、郭雙方雖然達成了和解，但雙方對立的氣氛仍然高漲，使得西港地區各姓村莊更加聯繫，產生結盟的現象，日後更因此形成了「派系」。³⁶同時對立的氣氛也影響了村莊陣頭的組成，在與西港鄉慶安宮刈香的宗教儀式結合後，各庄頭紛紛成立武陣，情結亦顯現在陣頭名稱上，如大塢寮的「五虎平『西』陣」、樹仔腳的「薛仁貴征『東』（白鶴陣）陣」，

36 國立中正大學人文研究中心臺灣歷史組，《珍藏西港》〈常民文化卷〉，頁37。

現今西港仔香中黃腳巾、紅腳巾等分類的「腳巾制度」，也因此而定型，形成西港鄉現存特殊的人文生態現象。³⁷

（二）聚落的變遷與發展

關於西港地區聚落莊頭的記載，比較完整者為同治初年編撰的《臺灣府輿圖纂要》一書，書中記載當時西港仔各聚落的狀況：「安定里西港仔保莊(二十四。城西南方八十里起)：中洲仔莊(八十里)、謝厝寮莊(八十里)、八份寮莊(八十二里)、外路頭莊(八十二里)、烏竹林莊(八十二里)、大竹林莊(八十二里)、南海埔莊(八十二里)、大塭寮莊(八十二里)、壕殼港莊(八十二里)、后營莊(八十二里)、蘆竹崙莊(八十二里)、塗庫莊(八十二里)、芋寮莊(八十二里)、沙塵仔莊(八十二里)、西港仔莊(八十三里)、雙張廊莊(八十三里)、含西港莊(八十三里)、姑媽莊(八十三里)、大西莊(八十三里)、打鐵莊(八十三里)、槎竹林莊(八十四里)、荔芝林莊(八十五里)、掘仔頭莊(八十五里)、海寮莊(八十五里)。」³⁸這二十四個莊頭的分佈與現今西港鄉的聚落關係，如下表所示：

37 資料直接引自黃文博《南瀛刈香誌》（臺南縣：臺南縣立文化中心，民國83年4月），頁315。有關西港香腳巾制度，在黃文博《南瀛刈香誌》中提到：「『腳巾』是陣頭人員繫纏於腰間的腰部，『西港仔香』香境的各庄陣頭，除職業陣外，大多各有專屬顏色的腳巾，尤其武陣更為明顯，凡同祖或有交陪淵源的村莊，都會選擇同一顏色的腳巾，作為共同的符號。」黃文博《南瀛刈香誌》（臺南縣：臺南縣立文化中心，民國83年4月），頁294。另外，有關腳巾分類的方式，方淑美在〈臺南西港仔刈香的空間性〉一文中將腳巾分為四種：「一、紅腳巾：烏竹林金獅陣、槎仔林宋江陣、新庄仔宋江陣、溪南寮金獅陣（主要以謝姓為組合動力）。二、黃腳巾：大竹林金獅陣、大塭寮五虎平西陣（宋江系統）、外渡頭宋江陣、南勢宋江陣、大寮宋江陣和管寮金獅陣（主要以郭姓為組合動力）；另外跳鼓陣雙張廊、下面厝、沙凹仔亦是黃腳巾。三、青腳巾：蚶寮（含塭仔內）宋江陣、埔頂宋江陣、後營宋江陣（前二者主要係同祖關係）。四、綠腳巾：八份宋江陣、竹仔港金獅陣、樹仔腳白鶴陣、學甲寮宋江陣（主要是結盟或師徒關係）。」方淑美，〈臺南西港仔刈香的空間性〉（國立臺灣師大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頁126。而在刈香遶境展開時，各庄各廟的陣頭，便依路程而忙於拜廟表演；期間，凡同屬腳巾顏色者，可結伴而演，但不同顏色者，則不可「碰頭」或「鬧場」，否則會視為挑釁而有大動干戈的危險。方淑美，〈臺南西港仔刈香的空間性〉（國立臺灣師大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頁126。

38 不著撰人，《臺灣府輿圖纂要》（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頁187。

表1-1 西港地區聚落古今分佈關係表

清領時期同治初年	民國95年
沙塵仔莊（沙凹仔）	金沙村
謝厝寮莊*	
后營莊	後營村
大西莊（太西莊）	樣林村
樣竹林莊◎	
八份寮莊	港東村
雙張廊莊	
烏竹林莊	
姑媽莊*	
荔芝林莊*	
打鐵莊*	營西村
塗庫莊*（頭庫莊）	西港村
西港仔莊	
堀仔頭莊	
中洲仔莊	慶安村
大塹寮莊◎	永樂村
大竹林莊	竹林村
壕殼港莊◎（蚵殼港莊）	新復村
含西港莊	劉厝村
南海埔莊	南海村
外路頭莊（外渡頭莊）	佳里鎮
蘆竹崙莊◎	安定鄉
海寮莊	
芋寮莊	不詳（管寮莊舊稱竿寮港）
資料來源：1、不著撰人，《臺灣府輿圖纂要》，頁187。 2、施添福總編纂，《臺灣地名辭書》〈卷七臺南縣〉，頁583。	
說明：1、打*者為逐漸散莊，現今已廢村不存在者。 2、打◎者為受外力影響，大舉遷徙他地的聚落。	

同治年間西港地區存在的聚落計有二十四個，這二十四個莊頭竿寮莊的聚落可能就是當時的管寮港，仍有待進一步查證外，³⁹外路頭莊在今佳里鎮外渡頭；蘆竹崙莊莊民在同治十年（1871）被曾文溪沖毀莊頭後，遷往現今安定鄉新吉村定居、海寮莊今劃歸安定鄉管轄；其餘二十個莊頭均位在現今西港鄉行政區域範圍內。

這二十個莊頭演變至今，有些受到外力的因素影響，整個聚落遷徙到別的地方；如樣仔林莊在日治時期昭和八年（1933）受到曾文溪治水工事實施的影響，整個聚落原本位於曾文溪河畔旁，被轉移至後營莊東方緊鄰太西莊的地方，現今地名稱為新樣仔林。⁴⁰除了人為因素的遷莊外，自然環境的變化也是影響西港地區莊頭遷徙的主要力量，如大正三年（1914）時曾文溪的改道氾濫，大塢寮全莊頭都難逃水患，莊頭的位置今天已經淹沒在曾文溪的溪底，村民則遷莊往北搬到今天大塢寮的位置。另外，在水患過後也有部分的大塢寮人往臺南市安南區移入，而舊大塢寮則成為曾文溪的行水區。⁴¹另外，壕殼港莊又名為蚵殼港莊，大正三年（1914）七月遭曾文溪大洪水沖毀，整個莊頭如同清領時期被曾文溪沖毀的蘆竹崙莊一樣，從此由地圖上消失。庄民四散至公親寮和溪埔寮，後於溪埔寮（位於現今西港鄉新復村）建庄。⁴²

另外，有些聚落在演變的過程中已經廢莊，至今僅存在文獻資料的記載或者老的記憶中，如謝厝寮莊、姑媽莊、荔芝林莊、打鐵莊、塗庫莊等。這些的聚落為何會廢莊，變成不適合人居住的生活環境呢？由此區自然環境的變化來看，這些聚落的分佈，大致上正好位於現今港東村、西港村、營西村、金沙村一帶，分佈在舊時道光三年（1823）以前曾文溪往漚汪溪（現今之將軍溪，又稱灣裏溪）出海的河道旁，在當時可是西港地區最繁華熱鬧的聚落。然而自從曾文溪改道後，此處河川

39 竿寮莊在現今西港鄉的舊地名上並不存在。筆者推測，今安定鄉管寮村的管寮莊聚落舊稱竿寮港，聚落分佈正好位在西港鄉旁。竿寮莊或許是《臺灣府輿圖纂要》編者或印刷者在記載時，一筆之差的紀錄。然竿寮莊聚落現今的位置，仍有待其他學者進一步的田野查證研究。

40 成文出版社，《臺南州街庄概況輯存》（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年），頁20。

41 李淑玲，〈西港鄉聚落的拓展與開發之研究〉，（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43。

42 成文出版社，《臺南州街庄概況輯存》，頁18。國立中正大學人文研究中心臺灣歷史組，《珍藏西港》〈常民文化卷〉，頁103。

變為沒有上游的斷頭河，溪道逐漸淤塞，目前將軍溪僅有溪口部分尚留有大溪流的舊形。也就是說在清領晚期至日治時期的這段期間，此處因上游河川斷流，形成地勢低窪、積水未退的區域。在這樣的環境下，一旦在臺灣夏、秋兩季節來臨時，會因排水系統未臻完善，逢颱風、大雨極易造成地區性淹水、積水的情況出現，也就會直接影響到當地居民種植農作物的收成。此外，以往此地因近溪水旁，利於取得水源灌溉田地，成為西港地區繁華富庶的區域；然而在河道改變後，斷頭溪水得不到上游河流的資助逐漸枯竭，溪流兩旁的田地逐漸得不到水源的灌溉，不僅影響稻米收穫量的多寡，有些田地更因靠近海邊，得不到淡水灌溉，土地土壤鹽鹼化的情形更為嚴重，甚至有可能直接影響到聚落的生存與發展。

另一項影響這個區域聚落存在的因素，與疾病的發生有密切的關連。臺灣地屬亞熱帶，氣候原本就潮濕，颱風肆虐過後，聚落四周佈滿凌亂不堪的污穢雜物，病菌更加最容易滋生繁殖，再加上蚊蠅的媒介傳播、所取得的飲水不乾淨，非常容易有傳染病的發生，如痢疾、霍亂的流行等。假如進一步配合文獻資料田野調查的研究，可以發現這些聚落廢莊的原因與瘟疫的流行關係密切。道光年間謝厝寮聞人謝淡格在雙張廊莊經營糖廠，並在頭庫莊（亦稱塗庫莊）設有「油車」專門提供榨取土豆油或麻油，因而富甲一方，這些聚落在清領時期的發展頗具規模。但是日治時期這個區域發生的一場瘟疫波及了頭庫與謝厝寮仔，造成此兩個莊頭從此散莊、廢村，⁴³雙張廊莊也遭受到波及，差點面臨散莊的命運。⁴⁴而其他在此地理環境周遭的聚落，也有許多傳染病的相關記載，如慶安村的中洲仔莊在日治時期因鼠疫遷走不少人；荔芝林莊則因風水不佳，居住環境有問題而散莊。⁴⁵打鐵莊在清領時期聚落規模頗大，但在日治初期大舉遷莊、散莊，也可能與瘟疫疾病的流行有密切的關係。

43 國立中正大學人文研究中心臺灣歷史組，《珍藏西港》〈常民文化卷〉，頁57。

44 國立中正大學人文研究中心臺灣歷史組，《珍藏西港》〈常民文化卷〉，頁95-96。雙張廊莊現今的小廟九天宮留有一塊五雷石符，並流傳有北港媽祖南巡鎮瘟疫的傳說故事。

45 國立中正大學人文研究中心臺灣歷史組，《珍藏西港》〈常民文化卷〉，頁80、116。

由於居住環境的惡劣，天然災害及瘟疫疾病的流行，使得早期在西港地區生活的先民們，隨時面臨不可測命運的挑戰，生命財產飽受威脅。故在傳統社會環境衛生差，醫療設備不足，瘟疫橫行的狀況下，西港地區的居民為了攘災避禍，而崇祀瘟王，以祈求心靈上的安定。儘管王爺的來歷傳說紛紜，但民眾崇祀的心理，大都為了遠離瘟疫。西港慶安宮的香科大醮典，也就形成此地區聚落發展後，另一項特殊的人文景觀了。⁴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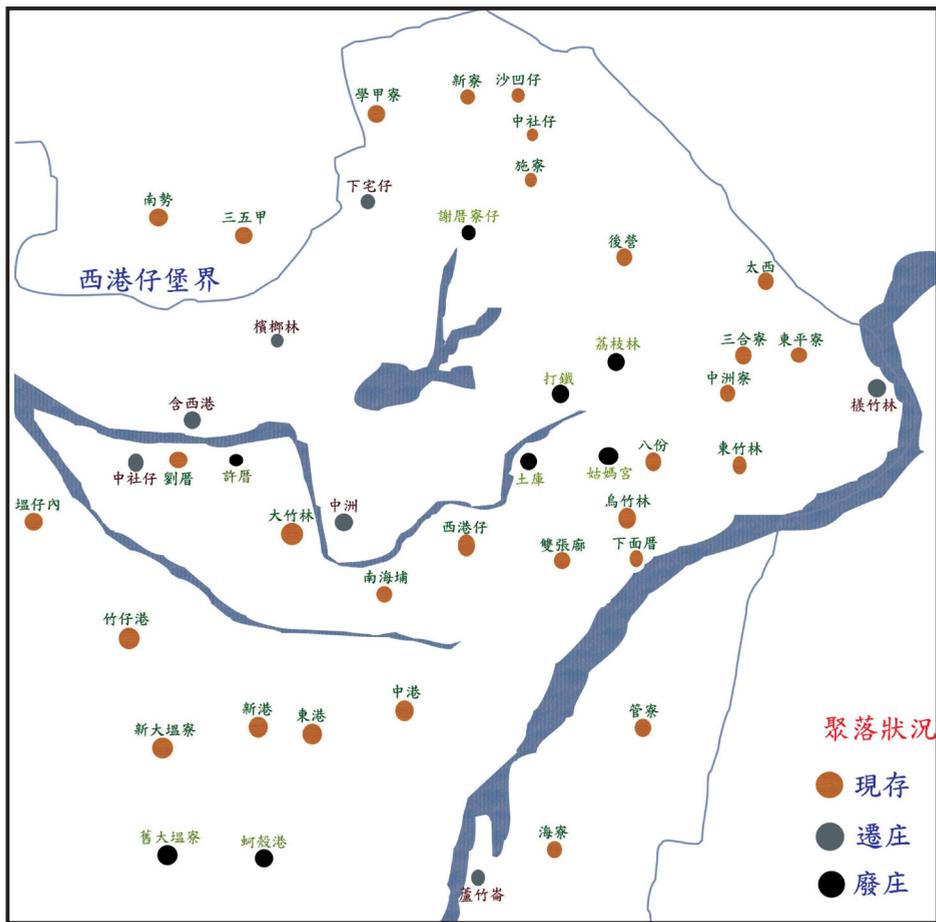


圖5 明治37年1904西港鄉聚落分佈圖：參考描繪自王俊昌、陳亮州、馬有成，《珍藏西港·宏觀歷史卷》（臺南縣西港鄉：臺南縣西港鄉公所，2005年），頁77。）

46 黃文博在《南瀛刈香誌》中，對西港慶安宮的香科大醮典提出了八點的特色：「1、歷史悠久…。2、拓墾性格：『西港仔香』的轄境，一直和先民向海爭地的拓荒開墾有關，時間越晚墾地越向西移，而加入香境者越多，或可由此探索曾文西或臺江的變遷歷程，與開墾的辛酸血淚，並可由此略窺刈香何以日趨蓬勃的內在基因。3、香醮合一…。4、步車混合…。5、謁祖進香…。6、蜈蚣獨行…。7、庄頭陣頭…。8、王船祭典…。」黃文博《南瀛刈香誌》（臺南縣：臺南縣立文化中心，民國83年4月），頁308 - 311。

四、結論

傳統社會聚落的發展，與自然環境的變遷，以及聚落周遭生活環境的改變關係密切，這種現象充分的反映在西港地區聚落發展的變化上。由本文的論述可知，西港地區聚落的形成得力於地理環境的優勢，由於臺地河川數量眾多，早期陸路交通頗為不便，西部平原的開墾大多需依靠海港之間的運輸，補充墾荒時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清領時期康熙年間，西港仔、含西港正好位居海濱，成為西港地區開墾時物質的集散地點，加速了聚落的形成與發展。另一方面，由於西港地區鄰近臺灣府城，軍事地位頗為重要，歷來臺灣的民變事件西港地區的聚落也多所參與，與官方合作平定民變，留下許多官方褒獎的文物，成為早期聚落發展的一項特色。

道光三年（1823）曾文溪改道後，使得西港地區聚落的發展進入了另一個階段。改道後的曾文溪不斷的將上游的砂石沖積入臺江內海，西港地區陸浮埔地不斷增加，成為當地聚落居民營生牟利的另一項重要經濟收入來源。嗣後新增埔地雖然有經過官方分配給照開墾，但仍然引發西港地區族姓對族姓，爭奪土地權利的械鬥事件，事件過後兩造雙方雖然達成和解共識，但對立的氣氛仍然瀰漫著西港地區各個聚落，影響了村莊陣頭的組成。在與西港鄉慶安宮刈香的宗教儀式結合後，現今西港仔香中黃腳巾、紅腳巾分類的「腳巾制度」，也因此而定型，形成西港鄉現存特殊的人文生態現象。⁴⁷

曾文溪的改道除了改變西港地區地形地貌外，也充分的威脅著當地居民的生命財產。改道後斷水溪河地區因地勢低窪，排水不便，作物種植常因豪雨而泡湯，造成聚落發展困難，居民陸續遷徙他地，聚落因而面臨散莊廢村的命運。然而打擊聚落發展最大的因素，卻是瘟疫疾病的流行，積水未退的區域除了飲用水不乾淨外，蚊蟲也容易滋生，造成傳

47 腳巾制度的成立，固然和姓氏宗族對立有關，但就目前的狀況而言，有些群體實際上是以「師傅傳承」做延伸而進行腳巾的分類，與早先依據姓氏宗族的分類已有不同。請參閱本文註釋33。感謝審查委員的指正。

染病的流行。清領晚期、日治初期的瘟疫，造成斷水溪河地區聚落的衰敗，許多聚落的居民遷徙他地居住，進而產生許多村莊之間鬥法、敗壞對方風水的傳說故事。也由於在聚落發展過程中生命財產的不安全感，使西港地區的聚落民眾只好將精神寄託在宗教神明身上，造就了臺灣第一香西港鄉慶安宮三年一度的刈香活動，也就形成此地區聚落發展後，另一項特殊的人文景觀特色。⁴⁸

48 西港鄉慶安宮三年一度的刈香活動，至今仍歷久不衰，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也可說是一種維繫區域之間聚落興盛的結果。因在聚落發展的過程中，雖然開始時居民會將希望寄託在神明身上，但最終神明卻成為凝聚地方力量的重要媒介，西港也不例外。透過神明的共同信仰，適當緩和了內部的派系矛盾。如今的現代社會，中產階級的懷舊心理，已促成西港刈香的成為全國性的宗教民俗活動，這又已超出社區在宗教層面之心理寄託的層次。感謝審查委員的指正。

參考書目

- 方淑美，《南瀛地形誌》（台南縣：台南縣文化局，民國89年）。
- 不著撰人，《臺灣府輿圖纂要》（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年）。
- 王俊昌、陳亮州、馬有成，《珍藏西港·宏觀歷史卷》（臺南縣西港鄉：臺南縣西港鄉公所，2005年）。
-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欽定平定台灣紀略》（台北：編者，1961年）。
-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案彙錄甲集》（台北：編者，1959年）。
-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5年）。
-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福建通志臺灣府》（臺北市：編者，1960年）。
- 成文出版社，《臺南州街庄概況輯存》（台北市：成文出版社，1985年）。
- 林聖欽等撰，《台灣地名辭書》（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2002年）。
- 吳新榮等，《台南縣地名研究輯要》（台南：台南縣政府，民國71年）。
- 周鍾瑄纂修，《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 施添福總編纂，《台灣地名辭書》〈卷七台南縣〉（南投市：國史館台灣文獻館，民國91年）。
- 高拱乾纂修，《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
- 陳紹馨著，《臺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台北市：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
- 陳國章，《台灣地名辭典》（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系所，民國87年）。
- 陳國瑛，《臺灣采訪冊》（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年）。

- 黃文博，《南瀛地名誌—北門區卷》（台南：台南縣文化局，民國87年）。
- 黃文博《南瀛刈香誌》（臺南縣：臺南縣立文化中心，民國83年4月）。
- 薛紹元，《台灣通志》（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年）。
- 藍鼎元，《平臺紀略》（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8）。
- 蔣毓英，《臺灣府志》（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施添福，〈清代臺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一）—以罩蘭埔為例〉《臺灣文獻》，55：4（2004），頁144 - 209。
- 施添福，〈清代臺灣北部內山地域社會—以苗栗內山的雞籠河流域為例〉《臺灣文獻》，56：3（2005），頁181 - 240。
- 施添福，〈臺灣傳統聚落的血緣構成：以研究方法為中心〉《宜蘭文獻雜誌》，47（2000），頁3 - 28。
- 楊護源，〈清代臺中大甲溪南地區的聚落拓殖〉《興大歷史學報》，17（2006），頁457 - 508。
- 洪麗完，〈大社聚落的形成與變遷（1715 - 1945）：兼論外來文化對岸裡大社的影響〉《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3：1，（1996），頁31 - 96。
- 陳秋坤，〈帝國邊區的客庄聚落：以清代屏東平原為中心（1700 - 1890）〉《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16：1，（2009），頁1 - 28。
- 盧嘉興，〈曾文溪與國塞港〉《南瀛文獻》，8，（1962），頁1 - 28。
- 方淑美，〈臺南西港仔刈香的空間性〉（國立臺灣師大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
- 李淑玲，〈西港鄉聚落的拓展與開發之研究〉，（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 洪燦南〈臺灣地區聚落發展之研究〉《臺灣文獻》，29：2（1981），頁187 - 209。
- 陳胤霖，〈臺南市安南區傳統村落祭祀空間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歷史與理論組碩士論文，2001）。

The Development and Vicissitude of Humanities Settlement at Shigang Area in Ching Dynasty

Shu-Hao Yang*

English Summary

Shigang Township located at west south of Tainan County and the lower north shore of Tsengwen River. It is an important communication line between Tainan City and Beimen Area. The north, south, west and east of Shigang Township is Jiali Township, Annan District of Tainan City and Anting Township of Tainan County, Chiku Township and Madou Township, it is not a township with port that near sea. However, the historical data shows the topography in Shigang Township was different in the past compares to what it has nowadays.

From the change of geography and history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study was developed by observing and study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settlement in early stage at Shigang Township.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settlement was compiled and interpreted by studying research report and related literature that edited in the past. This study aims to let readers have more understanding for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settlement in different areas in Taiwan.

Key words : Taiwan settlements, Shigang Zai; Shigng Township; Settlement Development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